

## 2012 年“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获奖感言(一)

【日】伊藤诚

我在日本主要的学术成就收集在六卷本的《伊藤诚全集》中(东京:社会评论社),英文版在本文最后的文献注解中。所有这些都来自最初投稿给宇野弘藏(1897~1977)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杂志。

宇野理论有三个特征。第一,以马克思《资本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不应该纠结于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是应当把它当成以历史事实与逻辑为基础的客观的社会科学进行研究和发。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就是这样具有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客观社会科学。

第二,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将其系统地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马克思的《资本论》呈现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属于第一层次。以基本原理为参照标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构筑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理论,这是第二层次。在世界史中,国家经济政策的历史变迁从重商主义开始,经过自由主义阶段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并要在不断变迁的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积累模式中被修复,这些资本积累模式以主导产业和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为主要衡量指标。列宁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最高阶段》(1917)应该属于第二层次。对当代世界经济以及单个经济更具体的分析属于研究的第三层次。这不仅需要运用基本原理,而且需要运用资本主义发展的中间阶段理论作为参照标准。

第三,在基本原理层次上,马克思“资本论”一些模糊不清的理论应该被精炼和完善。确实,宇野尝试把《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进行完善,其研究成果包含了大量富有见解和创新的观点,尤其是在价值和危机理论中。

追随着宇野的足迹,我继续从事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研究。1974~1975年,当第一次访问英国和美国时,我遇到了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复兴。于是,我尝试打通西方政治经济学和日本政治经济学之间的隔阂。此后,我的观点得到拓展,而且最终形成下面四个主要的领域。我自己的理论观点也在发展,已经偏离了宇野在研究基本原理过程中提出的问题。

收稿日期:2012-06-11

作者简介:伊藤诚(Makoto Itoh),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顾问,日本学士院院士、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 1. 关于价值理论

尽管宇野没有完全解决目前理解马克思主义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形的理论分歧问题,以及马克思关于价值总量与价格总量相等、剩余价值总量与利润总量相等的命题,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斯拉法主义者、新古典主义者中形成了一个战场。根据宇野理论中价值实体与价值形式在理论基础上的区别,我把分析这个有争议问题的传统的两表格方法表述为“伊藤三表格方法”,从而得出更令人满意的解释,可以参见我的书(1980,1988)。第二个表格,生产价格作为价值形式(以美元表示),能够推断出第一个表格用劳动时间(小时)表示的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实体。然后,这个就决定了第三个表格中不同行业的资本家和工人获得的用劳动时间(小时)表示的价值实体。马克思关于价值总量与价格总量相等、剩余价值总量与利润总量相等的命题必须被理解为第一个表格和第三个表格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第一个表格和第二个表格之间的社会关系。

另外一个马克思遗留下来的重要问题是如何考虑复杂劳动。马克思没有从理论上阐明怎样把复杂劳动时间换算成简单非熟练劳动时间。这个也是在各个场合批评反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个来源。希法亭、置盐信雄以及其他将其解释为复杂劳动力的高价值是由于培训和教育成本转移到其使用价值,从而在劳动过程中生产出更多价值实体。这个解释看起来违背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一个基本理论,即区分劳动力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我认为即使复杂劳动也与简单劳动一样是最基本的人的劳动能力支出,同样也是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1988)。假如为某种复杂劳动力进行专门教育与培训的成本被个人或家庭承担,那么复杂劳动力的价值将升高。但是,假如这些成本全部由社会支持,那么复杂劳动就不需要支付这些成本。对于未来各种诸如女权主义和替代经济秩序等领域,平等主义者的观点一定会对重新考虑经济民主的理论基础有用。我希望这个观点能够引起世界上更多学者的关注,也希望得到世界上更多同行的支持。

### 2. 关于信贷和危机理论

在宇野的指导下,我在自己的著作(1980,1988)中尝试描述在马克思积累理论和信贷体系基础上的完整、典型的商业周期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与劳动人口有关的过度资本积累危机理论,以及阐明劳动力商品化是资本主义矛盾根本原因的理论。投机性交易不断地发展,并通过信贷机制终结了繁荣,导致了接下来发生的古典商业周期理论中的剧烈经济危机。与宇野相比,我将这些理论更广泛地整合进我的治理理论中。

我认为宇野超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贡献,是从马克思动态资本积累理论中提出金融不稳定学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征是货币金融理论与危机理论结合在一起,这一点与其他学派的货币金融理论形成了鲜明

对比。我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并将其呈现在我的信贷与危机理论中(1980, 1988)。同时,我很幸运与拉帕维查斯合作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货币金融理论(1998)。

我们在这个领域的付出,已经揭示了在当代金融危机不断重复过程中各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并最终形成了世界性次贷危机。这些研究成果详见我的另外一本书《从次贷危机到世界经济危机》(2009)。

### 3.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

在《世界经济危机和日本资本主义》(1990)以及一些其他的作品(2000)中,我尝试运用马克思基本的积累和危机理论分析当代世界经济危机和日本资本主义经济。

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多种层次研究中方法论上的不同,宇野反对轻率而直接地运用基本原理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资本过度积累导致了1973~1975年通货膨胀危机,而且资本过度积累也与世界市场劳动力供给以及初级产品供给有限相关,于是,随着工资与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导致了利润压缩。因此,起因于劳动力商品化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再次出现,正如我们的基本危机理论所描述的。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不可避免的持续性的长期繁荣的后果,其表现形式是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而且不同于反映货币金融功能改变的典型的古典危机理论。

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大规模重建,发生在引进越来越多的先进信息技术之后。正如典型的古典商业周期的衰退阶段,这个时期的竞争压力促进创新,从而通过创造产业后备军来降低工资成本。工人阶级与资本家斗争占据优势的局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长期繁荣的末期,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了彻底的逆转。20世纪70年代末,在新自由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私有化的“退潮”、社会福利的削减、产业后备军的扩大更加弱化工人的社会地位。因此,自19世纪末,政府的经济地位上升——或者以帝国主义形式或者施行社会民主福利政策的凯恩斯主义——的历史倾向被逆转,更有利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这样一种逆转的历史潮流中,我们目睹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原理,特别是对工人阶级利益的损害。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开始阅读或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根据宇野的方法论运用第三个具体的研究层次来分析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与日本,我发现我们所处的时代并不是只关注资本主义基本原理及其本身与经济的特别关系,还有更有趣且更有意义的研究方向。

### 4. 关于社会主义

在我们时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严肃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危机及其政权解体,如何思考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以及如何思考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在格林的强烈建议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我越来越被这个有挑战的课题所吸引,于是开始研究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参与社会主义者关于经济核算的争论以及市场社会主义的辩论,讨论如何定义苏联社会模式以及苏联的当代系统性改变。这些研究成果都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95)以及其他两本书(1992,1995)中有所体现。

出乎意料,我发现宇野的理论以及我对价值、货币、金融和危机理论的扩展,在理解社会主义基本问题上是很有用的。例如,发生在米塞斯、哈耶克与泰勒、兰格之间的著名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争论是以某种方式并不与另外一个大的争论相关。该争论涉及价值理论、转形问题,并留给我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辩护。宇野强调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我同意他的观点,但是,现在我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不再局限于这样的意义。几乎所有的理论范畴诸如价值、货币、劳动、劳动分工、剩余价值、产业后备军、利润、利息和地租,总有一些被用于未来的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分析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一般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这是建立在以马克思《资本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科学基础之上的。这个理论是多样化的,并不局限于中央计划经济,至少在中期目标上是这样的,就像历史上多样化的资本主义模式。在这种观点下,我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可能性以及中国的实践道路感兴趣。

尽管我仍旧追随宇野的立场,认为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应当区分开来,但我倾向于讨论以《资本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用更加灵活的方式为社会主义提供理论基础,因为当代社会主义面临着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

在我的四个领域的贡献中,我感觉自己的成就是和世界上尤其是日本很多同事共同合作的结果,就像这个学会相互信任、同心同德地为劳动人民更好的将来一起努力工作的结果一样。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丁晓钦译)